

为什么革命会有阻力？为什么有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革过别人的命，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总是唱反调，成了走资派呢？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对守旧派的深刻剖析也是发人深醒的。他说：“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的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革命冲垮了压迫者的王国，他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却不那么容易冲掉，于是同新的环境尖锐抵触，于是就“怀旧”，“讲出很古的话”，再进一步，就复旧，干出复辟的事，直至进行反革命暴乱。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就是满脑子装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当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阶段时，他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意继续革命，于是，“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触动了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搅乱了他们既得的“舒服”生活。自然，对革命后的新秩序，他们必然这也看不惯，那也有反感，“回想旧时的舒服”，对修正主义路线，对资本主义制度也就“眷念不已，恋恋不舍”了。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他们同革命群众的矛盾也就愈尖锐。文化大革命的怒涛给了他们猛烈的冲击，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在诚心改悔，从头革命。但象邓小平那样的人，口头上也说“永不翻案”，然而靠不住的，因为确乎“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一旦重新上台，就“横下一条心”，反扑过来，想“咬死”革命了。

今天，我们重读鲁迅这篇文章，就要特别提高对顽固守旧派的识别能力。“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武汉师范学院供稿）

从“特等车”谈起

——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文系学员 杨维观 宋安东

一九三〇年初左联成立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演说。他指出：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

……这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克服“坐特等车，吃特等饭”的观念，就容易变成“右翼”。这里，问题提得多么尖锐，多么深刻！

这不只适用左联的作家。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清楚地看到：在革命队伍中有那么一些人，参加革命，象资本家入股一样，为的是将来牟取暴利，也就是“借革命以营私”，为了以后攫取高官厚禄，取得特权。

鲁迅对抱着“坐特等车”观念的人所作的判断，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具有科学的预见，灵得很。仅仅过了一年，左联受到了“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了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成了叛徒、特务。在党所领导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这样由“左翼”变成“右翼”，变成反动派的事例还少么？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现出原形，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

这是并不奇怪的。抱着“坐特等车”观念不放的人，他们“革命”的动机是为私，他们的政治目标，是要建立把“坐特等车”合理化神圣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追求的却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而社会主义革命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革私有制的命。这也就革到他们头上了。他们中有人作了大官，有好房子，有“特等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他们要保护这些东西，而革命却要限制这些

东西。这样他们自然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暴跳如雷，拚命反对社会主义，并且充当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盟主，同无产阶级相对抗。邓小平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在他看来，只要物质基础不够，就只能让走资派的大官们任意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去非法占有工农大众的劳动果实，“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了。这不是在地地道道地鼓吹“剥削有理”吗？

鲁迅当年批判过的“坐特等车”的思想，在今天，就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土壤，是走资派的命根子。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保护它，扩大它，使社会主义蜕变成资本主义。这是违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同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又一次生死大搏斗。

我们还应看到，“坐特等车”之类的资产阶级法权，一下子还不能全部取消，只能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逐步缩小，最后才能消灭。这样，伴随着的是斗争的长期性。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鲁迅批判“坐特等车”的话，我们应长期牢牢记住。

“历史决不倒退”，保护“特等车”，必然要失败，搞“复辟”，就是自取灭亡！如不信，请看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的覆辙。